



发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余万的红色区域。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

迎接红军到达陕北

毛泽东赞许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区深入开展群众工作，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根据地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为了让边区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习仲勋带头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到南梁没多久，就对周围几十个村镇的情况了如指掌。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蔡子伟曾经回忆说，每逢集市，习仲勋都与陕甘边区政府的几位领导一起到集市上转转，听取群众意见，每次都会有许多群众围拢过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习仲勋发动根据地群众行动起来，家家户户磨面，碾小米，做豆腐，准备蔬菜，杀猪宰羊。男女老少人背、驴驮，川流不息地把军粮、羊肉、鸡蛋、蔬菜送到红军部队。干部、赤卫军、游击队和还分头给红军带路，侦察敌情。

南梁的老百姓真心拥护党的领导，敌人对陕甘边区的几次“围剿”中，对群众严刑拷打，企图从群众口中得到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去向。敌人还到处张贴告示，悬赏银元3000块，马两匹，缉拿陕甘边区领导人习仲勋。南梁人民始终坚持革命的气节。敌人在坚强的人民面前终究还是一无所获。陕甘边区干部打下的坚实群众基础，为迎接长征红军的到来奠定了必备条件。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身处陕甘边区的习仲勋时刻关心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通过地下党及统战关系，多种渠道了解中央的最新消息。据当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回忆：“我们收到甘泉、延安、郃县教育局和高等学校转来上海中央局发出的‘八一宣言’材料，知道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号召组织地方抗战队等，也知道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军事委员会朱德、周恩来、王稼祥。7月下旬，

陕甘特委书记习仲勋同志主持召开扩大会，由我起草决议案和形势报告以及动员1600人参加红军通知，经会议通过后印发各地。”

1935年7月下旬至8月初，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研究陕甘边区工作的同时，专门研究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工作。8月5日通过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且更顺利地向北进攻。”在这种形势下，陕甘边区要高度重视中央红军将要到达地区——甘肃的工作，因为“向甘肃发展，在策应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方面有着重大意义”。

这次会议以后，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甘肃敌占区的工作，在敌占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陕甘根据地红军胜利的消息，为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准备了群众基础。

据秦生的《西北红军长征史》记载，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后，当地群众因早就听说过红军的英名，所以一听来的部队是红军，立即开门迎接，并热情地为红军腾出房屋，置办粮草。毛泽东称赞道：“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秘闻》一书中记叙了陕甘红军迎接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动人情景：“10月14日或15日，正当他们即将离开环县的羊肠小道，到达陕西边界的时候，毛的警卫员陈昌奉看到了五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而来。他们身强力壮，年纪不大，身跨驳壳枪，头缠白头巾。到了面前，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陈问他们是谁，其中一人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递交一封信。他在哪？’据陈说，他们是红二十六军司令员、毛的朋友刘志丹派来的代表。毛会见了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大声告诉他们，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了。”



陕甘边特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蔡子伟曾经回忆说，每逢集市，习仲勋都与陕甘边区政府的几位领导一起到集市上转转，听取群众意见，每次都会有许多群众围拢过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